

HONG GUO XIAN DAI
HUA DE LI SHI JIN CHENG
HONG GUO XIAN DAI
HUA DE LI SHI JIN CHENG
HONG GUO XIAN DAI
HUA DE LI SHI JIN CHENG

中国

主编 胡福明

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

1987

HONG GUO XIAN DAI
HUA DE LI
SHI JIN CHENG
ZHONG GUO XIAN
DAI HUA DE LI
SHI JIN CHENG

安徽人民出版社

ZHONG GUO XIAN DAI HUA DE LI SHI JIN CHENG

中国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

主编 胡福明

撰稿：邹农俭 叶南客 李怀印

王世生 项光勤

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登记证号:(皖)01号

责任编辑:丁怀超

责任校对:李华媛

装帧设计:牛 昕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胡福明 主编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381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合肥永青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5 字数:40万

版次:1994年12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174-6/D·193

定 价:15.80元

印数:00001—3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安徽省 1994 年
“五个一工程”图书出版领导小组

组 长： 窦永记

副组长： 陶有法

成 员： 武学斌

郭明刚

严云绶

徐滔滔

杨咸海

目 录

绪 论	(1)
一 现代化面面观	(2)
二 现代化的特征	(23)
三 现代化的阶段划分	(33)

上 编 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探索

第一章 传统的极限	(42)
一 从“陷阱说”和“萌芽说”谈起	(42)
二 “资本主义”与现代化	(48)
三 传统社会晚期的经济与技术	(50)
四 文化模式与现代化	(53)
第二章 中国现代化的挑战阶段(1840—1894)	(61)
一 文化主义的传统秩序	(62)
二 文化主义的退却	(73)
三 防御型现代化模式的探索	(84)
四 寻求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100)
第三章 中国现代化的准备阶段(1895—1949)	(114)
一 民族主义的初步兴起	(114)
二 传统政治结构的崩溃	(132)
三 政治的衰败	(154)
四 现代民族国家的肇建	(171)

中 编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四章 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上).....	(184)
一 经济现代化的初始阶段与发展特征.....	(184)
二 从增长到发展:经济现代化的前提与起飞过程	(189)
三 经济结构的现代化.....	(201)
四 国民经济体系的现代化.....	(212)
五 经济调控体制的现代化.....	(225)
第五章 工业化与经济现代化(下).....	(231)
一 工业化的过程与基本格局.....	(231)
二 工业结构与行业体系的演变.....	(239)
三 工业组织结构的发展变革.....	(246)
四 乡镇工业崛起与农村工业化.....	(253)
五 工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及走向.....	(261)
第六章 城市化与城乡关系.....	(270)
一 城市化的动力和目标.....	(270)
二 古代城市与城乡关系.....	(276)
三 近代的城市化运动.....	(282)
四 城市化的曲折演进.....	(285)
五 新型城乡关系的形成.....	(297)
第七章 社会结构的演变.....	(322)
一 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论.....	(323)
二 阶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334)
三 社会阶层分化与阶级、阶层结构	(339)
四 当代社会结构中的利益矛盾与调整.....	(354)

下 编 政治、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第八章 政治现代化	(364)
一 政治结构的演变	(364)
二 政治文化的演进	(380)
三 政治的合理化	(399)
第九章 文化现代化	(404)
一 传统的文化秩序	(405)
二 传统文化秩序的破坏与崩溃	(414)
三 传统与反传统:文化的分化	(420)
四 文化的政治化	(427)
五 文化的自主	(447)
第十章 人的现代化	(464)
一 人权保障与社会保障	(464)
二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善	(480)
三 城乡居民生活方式的历史演变	(492)
四 国民人口素质的提高	(504)
五 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演变	(520)
结 语	(530)
附 录:现代化与传统:从冲突到交融	
——国外中国现代化研究概述	(534)
后 记	(552)

绪 论

进入近代以来,具有古老文明历史传统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经历了 2000 多年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之后,中国由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时期,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正是在自 1940 年鸦片战争爆发至今日改革开放的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走上了逐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回顾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不仅可以总结历史的经验,记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而且有益于今日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我们在考察人类对“现代化”这一特殊的社会变迁现象的认识过程时,先要了解一个基本事实:即在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完成之前,或者说,在出现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之前,真正意义上的明确的“现代化”概念是无从产生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现代化社会的诞生,是 20 世纪上半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现代化概念的产生和现代化意识的盛行也正是从这时才开始的,并且是从最早完成现代化的地区(北美和西欧)开始,进而传播到其他地方。在此之前的 100 多年时间里,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一直随着这一过程本身的推进而不断地变化着。

一 现代化面面观

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变迁现象,也可以称为一种历史的过程。这一现象或过程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同时又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人类进化等现象密切相关。

一、从进步、进化到现代化

现代化思想在西方的演进,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欧美各国的现代化历史笼统地分为“前现代化”阶段(文艺复兴之后至18世纪末工业革命前夕)、“现代化之中阶段”(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后现代化阶段”(二战之后),那么,现代化思想在西方的起源、演进和成型,也可以分成时间上与之相对应的三个不同阶段。

1. 前现代化阶段:西方现代化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这一阶段出现的确信人类光明未来的进步观念。进步观念建立在当时流行的经验主义哲学基础上。英国经验论哲学家洛克(Locke, 1632—1704)认为,人的一切认识都是通过后天的经验获得的,没有任何先于经验的天赋观念,但观念有明晰的,有不明晰的,知识有真有假,所以必须一步一步修正谬误,补充新的东西,由此就会产生进步。把进步观念阐发得最透彻的是法国哲学家孔多塞(Condorcet, 1743—1794)。孔多塞认为,人类精神的进步,就是理性不断获得新的力量,挣脱束缚它的锁链——偏见、迷信、因循守旧等非合理的东西。而理性的解放,正表现为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应用这些科学理论而实现的技术进步。孔多塞强调,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直接有用于个人的幸福和国家

的繁荣；而且通过科学的力量打破偏见和迷信，增强理性的力量，还可以修正道德和政治上的谬误。这些进步的广泛传播，将会在未来逐渐地消灭不同的国民之间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随着人类道德的完善，战争也将消灭。现在仍属落后的各民族可以直接借用先进文明，缩短与发达民族的差距。依靠技术进步，人们将会以较少的支出享受比今天更有价值的财富和服务。科学的进步还会导致法律、教育、公共制度等社会技术的进步，推动社会制度的进步。

前现代化阶段的进步观念，是文艺复兴以来科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与中世纪欧洲在天主教会的精神控制下盛行的蒙昧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人类第一次在科学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进步的信念，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此后出现的进化论思想和现代发展思想，可以说，都是此一阶段进步观念的直接延伸和发展。进步观念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当时还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还没有出现一个工业社会的轮廓，所以，人们尽管从科学革命的事实中确立了社会进步的坚定信念，但究竟进步到哪里去，还不曾形成一个明晰的认识。一句话，在 17、18 世纪的进步观念中，并不含有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演进的内容。

2. 现代化的阶段：18 世纪末开始的工业革命，将人类历史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现代化时代。工业革命活生生的现实，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人类必将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前景。因此，前一阶段在目标上尚显得模糊不清的进步观念，到了 19 世纪，便演变成目标明确的以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为主题的各式各样的社会进化思想。

从 18 世纪进步观念跨越到 19 世纪工业主义进化思想的第一位先知，是法国贵族圣西门(Saint-Simon, 1760—1825)。他和一度曾作为他的私人秘书的实证主义哲学奠基人与社会学创始人孔德(Comte, 1798—1857)密切合作，依据他们所假设的人类思想发展

“三阶段规律”(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即(1)军事社会,靠武力形成内聚力;(2)法律社会,依靠法制形成社会团结;(3)工业社会,人们靠新兴的工业秩序形成有机的联系。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Spencer, 1820—1903)是古典社会进化论的创始人。斯宾塞相信,进化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上至天体的形成,下至物种人种的起源,万事万物无不受进化规律的支配。社会的发展也不例外。在从分散的单个的人类向集中的社会的人类转化中,这条规律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他从社会进化由简至繁的原理出发,将社会分为简单社会、复杂社会、双倍复杂社会、三倍复杂社会四种类型。另外,斯宾塞又根据社会内部管理形式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特点,把社会分为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两类,认为前者是一种集权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公民的等级、职业和居住地区都固定不变,地位靠世袭,经济上自给自足;后者则是一种建立在自愿合作和个人自我制约基础上的分权制社会,社会等级、职业和居住地都是开放性的,可以变动,经济上不再是自给自足,而是依靠自由贸易。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新社会进化论逐渐取代了古典进化论。在新进化论思想家中,最值得重视的当数滕尼斯和韦伯。德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滕尼斯(Tönnies, 1855—1936)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从“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到“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变迁理论。他在理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所重视的是社会关系的变化。他认为,在礼俗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自我与他人构成了“持续的真正的共同生活”,那里不存在“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东西”的本质区别。(家庭中的不分彼我,是这种特征的最好例证)。法理社会关系与此根本不同,在这种关系中,自我与夫人都把对方看成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用滕尼斯自己的话说:“无论是谁,如果不是同可以评价为至少与自己所给予的东西同等的偿付或回报相交换,就不会对他人做什么或给予什么,也

不想对他人施惠什么或给予什么。……一切财产，都是以与占有它的主体同样分离为前提的——人所占有和享受的东西，都是在排斥一切其他人的意义上占有和享受的。在现实上，没有所谓的共同财产。”^① 这里所描述的，实际上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一种社会关系。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Weber, 1864—1920)的社会变迁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在韦伯看来,理性化是一条贯穿于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主线。反映在经济领域,理性化就是摒弃非理性的欺诈、暴力、投机和巧取豪夺,从理性的手段追求正当的价值,并把资本增值视为最高目的。这种理性化的做法,体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精神在近代西方的兴起,又是靠加尔文教的伦理促成的。反映在政治领域,理性化便表现为传统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变。按照韦伯的解释,传统型权威建立在对于习惯和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之上,是一种由族长或部落首领之流来行使权力的统治类型。法理型权威则建立在对于正式制订规则和法令的正当行为要求之上。在这两者中间,还存在一个感召型权威,建立在某个英雄人物、某位具有神授天赋的人物的个人魅力上。先知、圣徒和革命领袖是其标准的范例。政治理性化的结果,或者说法理型权威的最纯粹的形式,便是所谓“科层制”。科层制的主要特征是:统治结构的每一项职能分别与一项官职对应;设有严格的办事规章和工作纪律;等级森严,上级监督下级;严格的职务权限;文件档案构成管理基础,等等。韦伯的社会学理论十分庞杂。应该说,他在现代社会变迁方面的真知灼见,直接构成了二次大战后现代化理论的源头。

3. 后现代化阶段:二次大战后,欧美各国经过上百年乃至一

^① 转引自葛永健:《社会结构与变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页。

Ercklen) 著《比较政治学》(New York, 1983), 第 67 页。

个半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整合,结束了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进入了所谓“后现代化”阶段。西方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到这个时候,终于能够对西方社会的这一巨大变革过程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和总结,明确提出了“现代化”这一社会科学概念,提出了解释这一变革过程的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模式。

50-60年代西方学者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受到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首倡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的深刻影响。在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启发下,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把现代化定义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而所谓传统农业社会,一般认为具有这样一些特征:(1)个人的社会地位受先天决定。换言之,一个人在社会上处于怎样的地位,往往取决于他(她)的出身;(2)行为规范具有特殊主义性质。评价一个人的行动时,不是用普遍一致的尺度去衡量,而是用特殊的标准看待;(3)弥散型的社会关系。即彼此界限不清,责任不明确;(4)社会群体稳定,空间流动有限;(5)职业分化比较简单、稳定;(6)尊卑分明的社会分层结构。现代工业社会的各项特征与传统社会恰恰相反,具体表现在:(1)社会地位取决于后天的业绩;(2)行为规范具有普遍主义性质;(3)特定型的社会关系;(4)高度的社会流动,既包括水平型的,也包括垂直型的社会流动;(5)非常发达的职业体系;(6)没有尊卑之分的阶级结构;等等。^①西方学者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上述特征的理解,应该说,是在帕森斯所创立的一系列“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现代化”,在他们看来,自然是传统社会的各项特征逐渐减弱、消失,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相应地增强,直至完全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

^① 苏顿(Frank X. Sutton):《社会理论与比较政治学》,收入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等编《比较政治学选读》(New York, 1963),第67页。

当然,每位学者在解释现代化的含义时,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不同的界说。但是,在界定方法上,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所给出的现代化定义,显得十分笼统,属于概括性而非描述性定义。例如,亨廷顿把现代化说成是“一个多方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①布莱克则称,现代化是“一个描述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事务发生迅速变革的过程的一般概念”。更具体地说,现代化乃是“反映着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②施美尔舍的看法是,现代化是一个“技术变革、经济变革和生态变革普及于整个社会与文化机体的过程”。^③《中国的现代化》一书的9位作者一致认为:现代化“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他们强调现代化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④上述各种定义本质上均属于“二分法”类型,即把“传统”与“现代”当做对立的两极,进而将现代化视为传统到现代的过渡过程。用铁普斯的话来说,现代化“成了从原始的糊口经济到技术密集的工业化经济;从臣属的到参与的政治文化;从封闭的先赋决定的身份制度到开放的成就取向的身份制度;从大家庭到核心家庭;从宗教性质的到世俗性质的意识形态,如此等等的过渡(或者说一系列过渡)过程”。^⑤

除了用“二分法”来给现代化下定义之外,还有部分学者抓住现代社会变迁中的某一关键“变项”,来描述现代化过程。在这方

①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②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11页。

③ 施美尔舍(N. J. Smelser):《社会学》,New York, 1973, 第748页。

④ 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页。

⑤ 铁普斯(Dean C Jipps):《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一项批评性考察》,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15卷第2期,1973年3月。

列维的定义颇具代表性。列维在1966年出版的《现代化与不同社会的结构》以及此后一系列著述中,一直坚持以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作为现代化的关键变量。他认为,当这一比率达到这样的地步,即在不发生深远社会变革的情况下,生物能源(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它指的乃是人力)的增长已经变得无法补偿非生物能源的哪怕是极小量的减少,此种社会或国家便可以被认为是现代化了,而且这种比率越高,现代化的程度也越高。^①不难看出,列维在这里把现代化跟工业化等同起来了,或者说,他把工业化着成了现代化的一个核心过程,因为生物能源与非生物能源的比率,所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过程技术化、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程度,并不能说明社会其他领域的变迁情况。威尔伯·摩尔更直截了当地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他在所著《社会变迁》一书中,从工业化的条件、与工业化相连的其他领域的变化以及工业化的后果等方面,讨论了现代化过程。^②另外,历史学家许华兹受韦伯学说的启发,把“合理化”视为现代化的实质。在他看来,所谓现代化,就是人类对自身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合理控制不断扩张的过程。^③霍尔的定义大同小异:“现代化是有系统的、持续不断的、有目标的运用人类的各种能力,合理地控制人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达到人类的各种目的。”^④

总之,西方学者在给现代化下定义时,不外用两种方法:一是两分法,把现代化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一是关键变量法,把式兹兹。辟长升升取当甜来。”

① 见列维(Marion Levy):《现代化与不同社会的结构》第一卷(Princeton,1966),第9—15页。SS号,编号8801,台湾出版社。

② 摩尔(Wilbert Moore):《社会变迁》(Englewood Cliffs,1963),第89—112页。

③ 许华兹(Benjamin Schwartz):《“传统与现代性”作为解释类型的局限性:以中国思想史为例》,载《戴达罗斯》杂志,第10卷第2期,第71—88页。

④ 霍尔(John Hall):《转变礼申的日本现代化观》,收入詹森(M. B. Jansen)编《日本人对现代化态度的变化》(Princeton,1965),第23—24页。

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或合理化。两种方法各有利有弊。用后者所下的定义,内容明确,涵盖面不很宽泛,避免了前者无所不包所带来的麻烦。但是,这种定义在实际应用中却没有多大意义。既然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合理化,那么,与其研究现代化,何不直接研究工业化或合理化?与其给现代化下定义,何不直接给工业化、合理化下定义?正因为关键变项法不能使现代化成为一个真正的理论概念,而往往成了其他术语的同义词,所以,上述列维等人所下的定义,已很少被人们接受。近几十年来学术界越来越普遍使用的是两分法。

当然“两分法”也远远不是无懈可击,一个最容易指出的缺陷是由此所产生的定义无所不包,结果也使得现代化的概念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例如,假使现代化真的如亨廷顿所说是一个囊括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的多侧面的过程的话,那么,现代化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总得有一个特定的界限,而不可能漫无边际地无所不包。否则就不能成其为一门学科,这是其一。其二,两分法所注重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结果很容易使人们把焦点放在社会内部的诸因素上,低估甚至忽视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对于现代化先行者来说,这样做可能不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因为它们的现代化主要是内因起着主导作用(两分法之所以产生于西方学术界,恐怕跟它们的现代化历史经验不无关系),但对于后来者而言,情况则大不相同。世界现代化运动历史表明,外部因素在后来者中间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些因素包括:国际战争、殖民统治、国际政治和军事关系、国际贸易以及资本的跨国流动,等等。如果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历按埃森斯塔德所说可分为两大类的話,那么,先行者大致属于“变革类型”(type of change),其特征表现为“结构的分化”。后来者大致属于“回应变革类型”(type of response to change),以

内部制度对“不断变化着的问题和要求”的承受力大小为特征。^①显而易见,对后一种类型来说,外部因素极为重要。其三,笼统地把现代化套入从传统到现代的公式,还很容易使人们把“传统”误解为“现代化”的对立物,把每个民族的传统社会毫无区别地加以看待,导致简单化、形式化的认识。事实上,不同的传统社会之间,在民族特性、文化心理、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另一方面,传统的东西也并非必然地跟现代化对立,相反,其中某些因素可能对现代化构成十分有利的条件。由此可见,两分法确有加以修正的必要。

二、从“变法”到现代化

中国人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现代化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在此之前,欧美地区汹涌澎湃的现代化浪潮虽然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中国,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均显得无动于衷,极少数留心时务的士大夫在对西方社会政治和风俗人情作了一番了解和介绍之后,也未曾进一步推究掩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一场巨变,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僚士绅,对于西方的科技和物质文明一直采取贬低和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要么认为这些东西中国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要么断言它们纯属奇技淫巧,派不上任何用场。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发生后,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一部分清朝上层官员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跟西人打了多年交道之后,深切感受到,现在所遇到的对手,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称其“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尤为难得的是,个别务实派官员已朦胧地认识到,现代化是世界潮流,在西方国家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走现代化道路也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用他们的话说,中国正

^① 埃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现代化:抗拒与变革》(Englewood Cliffs, 1966),第43页。